

李佩史論選集

啓功題籤

李侃史论选集

李 侃 著

中 华 书 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李侃史论选集/李侃著. —北京:中华书局, 2002

ISBN 7-101-02986-8

I. 李… II. 李… III. ①李侃一文集②中国—近代史—研究—文集 IV. K250.7-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46533 号

责任编辑:毛双民 陈雅

李侃史论选集

李侃 著

*

中华书局出版发行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

北京冠中印刷厂印刷

*

850×1168 毫米 1/32·22 1/2 印张·4 插页·515 千字

2002 年 4 月第 1 版 2002 年 4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1-2000 册 定价:43.00 元

ISBN 7-101-02986-8/K·1265



李侃先生

李 侃 简 历

李侃，曾用名李太岩，辽宁本溪人，1922年生。中国共产党党员。原中华书局总编辑；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委员；全国政协学习和文史资料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史学会副会长；中国现代史料学会会长；香港中华书局董事长；《文史知识》主编；北京师范大学兼职教授；中山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中心荣誉顾问。

1939年参加秘密反满抗日活动。1945年起历任本溪民主青年联合会主任，中共辽东三地委宣传干事。1948年后任中共中央东北局宣传部干事、副科长、部长秘书、办公室副主任，中共中央地方工作部组长、中共中央宣传部干事、高教出版社秘书主任。1958年后，任中华书局编辑组副组长、编辑室副主任、副总编辑、总编辑。是第七、第八届全国政协委员。

著名史学家和出版家，已出版的主要著作有：《中国近代史散论》（人民出版社1982年4月）；《朝夕集》（辽宁人民出版社1985年6月）；《近代传统与思想文化》（文化艺术出版社1990年9月）；《史林随想录》（河南人民出版社1991年7月）；《中国近代史》（与他人合著，中华书局1977年初版，1995年修订第4版）；《中国近代史论丛稿》（人民出版社1999年2月）；《芳古集》（广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5月）。

自序

1958年7月,我进入中华书局,同时也开始学习和研究中国近代史。虽然我从中学时起爱好文学,也曾发表过短篇小说、诗歌、散文,但对于中国近代史这门学科,却完全是外行,既无学历,又无师承,而且起步很晚。由于工作上的需要,加上自己对中国近代史的浓厚兴趣,于是就如饥似渴地从头学起,边干边学。充分利用“业余”时间,有系统地阅读了大量的历史资料,对各种有关中国近代史的著作、论文和学术动态,也留心阅读。我研究中国近代史还有两个有利条件,一是我过去长期作秘书和理论宣传工作,养成手勤笔快的习惯,而积累的理论知识又便于驾驭史料,作宏观研究;二是当时我所在的中华书局学术气氛很浓,参加学术活动的机会和与学术界的联系也比较多。这样,从1961年,我开始在报刊上发表学术论文,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以后。当时,怀着对十年动乱和“四人帮”的一股怨气,又加上要努力赶上的决心,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真是夜以继日地读书、写作,直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在国内报刊上已发表了一百几十篇文章。现在我已年近八十,身患重病,在工作和研究上都可以划上句号了。这忙忙碌碌、风风雨雨,而又平平淡淡的一生,本来可以不留痕迹地默默终结。但是,又一思考,总还是不甘心就此完结,因此又在病中,从已发表的文章中选出四十四篇学术文章,编成这本集子。这些文章,从时间上说,从鸦片战争到抗日战争都有涉及,从内容上看,谈政治、文化思

想方面较多,也写了一些历史人物和史学短论。在有的文章中,对一些有争议的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比如关于中国近代史的下限问题,我一直主张应该到国民党蒋介石统治的灭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也就是说中国近代史应该是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开始到终结这一整个时期的历史。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可惜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部完整的中国近代通史。我的这个观点,以及其他一些对重要问题的看法,曾得到史学界多数同行的赞同。虽不敢说自成一家之言,但也是一个历史学工作者,对一些重大历史课题,发出了自己的声音。

本来,在有生之年,还想对中国近代史的某些问题作些研究,时时想到有些该做而未做的事情。比如我参加编写的《中国近代史》这本高校教材,虽然已出了第四版,累计印了一百万册以上,还得过优秀教材奖,但我总觉得还很不理想,因为它只写到五四运动,因此不是一部完整的中国近代史。而我一直主张,中国近代史的下限,应当写到蒋介石国民党统治的灭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在第三版出版以后,我就曾设想再增补几章,把北洋军阀、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新中国建立都写进去,使这本书真正成为第一本完整的中国近代史高校教材。但是因为从1995年突患重病,这个愿望是无法实现了,对此一直耿耿于怀。我希望,此书的其他作者和中华书局在不久的将来能补上这个缺陷。

收进这个集子的文章均按原样不做大的修改。

中国近代史是十分丰富而复杂多变的。从十九世纪中叶到二十世纪中叶的一百多年中,比较大规模的反侵略战争就有六次,反封建的武装斗争不下几十次,当然还有各种群众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这些重大事件构成了中国近代史。社会的剧烈动荡,导致社会的剧烈变革。近代中国一百多年的变化,远远超过了中国古

代的变化。这些是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困难所在,也是深刻的意义所在。我是力求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去进行研究的。直到现在,我仍然认为这是一种真正的科学的历史观和方法论。只有唯物主义的历史观才能对近代中国社会错综复杂的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以及这些矛盾的斗争进行科学分析。什么是历史唯物主义?可以有千言万语,但简要地说,就是尊重史实,实事求是。这个问题说来容易,实际做起来并不简单,在“左”的思想指导时期,往往把历史唯物主义当作标签和教条,从而被公式化、庸俗化了。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才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取代了猖獗一时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整个思想理论战线如此,历史科学研究也是如此。尽管我也注意了不要把唯物史观公式化、简单化,但是因为运用得不够好,有些文章,仍不免存在着片面性。

中国近代史最根本的问题是什么?可以有各种不同的说法,我认为归根到底,还是如何认识资本帝国主义侵略和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问题,也就是如何认识反帝反封建的变革和革命的问题,当然也可以说如何看待中国近代化的问题。现在人们常说“以史为鉴”,“前事不忘,后事之师”。那么,就近代中国历史而言,“鉴”些什么?“前事”是些什么事?这些事是怎样发生?为什么发生的?又给中国带来了什么结果?要回答这些问题,就要从历史事实出发,近代中国最基本的事实是什么?最基本的事实是资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封建主义的压迫把中国变成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而为救亡图存,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反帝反封建的变革和革命,就是近代中国最基本的事实。其他一切事实,都是从这个根本事实产生的。

资本帝国主义为什么侵略中国,因为他们要把中国变成他们

的殖民地,也因为中国落后。中国为什么落后?因为外有强敌侵略,内有封建压迫,落后就要挨打,越落后越挨打,越挨打越落后。不仅如此,挨打就要反抗,反抗必先觉醒。就中国近代史而言,不忘的“前事”,最重要最根本的就是反帝反封建的变革和革命,是人民在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中不断觉醒,近代中国在不断沦落中又不断进步发展。人们不可忘记的就是这个“前事”。这个充满屈辱和灾难的“前事”,也充满了前进的斗争和希望。在争取民族独立解放的各种斗争中,都有胜利和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和挫折的教训。这些经验教训,对于后来的中国人都是宝贵的精神财富。

历史和现实是历史地联系在一起的,历史是过去的现实,现实是未来的历史。这两者有历史的联系又有历史的区别,把二者完全对立起来、割裂开来或等同起来都是不符合实际的。

历史前进的道路是曲折的,走弯路是不可避免的,我们不应该苛求前人,谁也不能改变既定的历史事实,历史是不以任何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历史过程。

我虽然没有直接师承的老师,但在我学习和研究过程中,受教于师友者可谓多矣,其中有前辈学者,有同辈的好友,也有青年学者,对于这三辈师友,我是怀着敬意和谢意的,也是终身难忘的。平平淡淡的一生,写了这些平平淡淡的文章。虽然文章平庸肤浅,但我并不后悔,因为我的一生是在时代的风雨中走过的。那动荡变革的岁月,使我体会了近代中国的历史,而且把研究记住这段历史当作自己的事业和责任。

最后,要感谢中华书局同仁和宋一夫、李岩及毛双民、陈雅同志的支持。从1958年我到中华书局到1998年离休,在书局工作了整整四十年,结下了深厚的感情,正是在他们的支持下,这本集子得以出版。这里,还要特别感谢老友元白先生,他年近九旬,还

在病中为我的这本集子题写书签。另外,我的儿子李格、儿媳刘建光在护理我的同时,为编我的这本文集和年谱花费了很大精力,回首七十年往事,感慨万分。这本集子,如能对中国近代史的研究起到一些参考作用,就是我最大的欣慰了。

2000年12月于北京芳古园

目 录

自序·····	1
鸦片战争前后“士林风气”的变化·····	1
论林则徐思想的历史地位·····	21
论魏源·····	36
农民战争的高峰和天京悲剧·····	65
清流派与中法战争·····	94
洋务运动与中国近代文化·····	115
论中国近代史上的封建顽固派·····	133
大冲击和大转折	
——甲午战争对中国的打击和影响·····	159
甲午冲击在近代中国思想文学领域引起的变化·····	172
戊戌维新与近代中国思想文化·····	189
康梁思想同异述论·····	218
翁同龢略论·····	246
戊戌变法时期对《校邠庐抗议》的一次评论·····	264
清末士大夫思想演变的一个典型·····	278
义和团运动研究中的几个问题·····	295

从义和团运动谈中国近代农民问题·····	307
对宣统政局的若干考察·····	313
从江苏、湖北若干州县的光复看辛亥革命的 胜利和失败·····	339
赵尔巽与辛亥革命前后的东北政局·····	374
东北立宪运动和立宪派琐议·····	400
孙中山与传统儒学·····	414
所谓孙中山“激进主义”质疑·····	435
洪秀全·康有为·孙中山 ——近代中国三个划时代人物及其救国方案的比较·····	445
梁启超史学思想试论·····	462
鲁迅与辛亥革命·····	485
五四运动和蔡元培的思想品格·····	499
抗日战争与中国知识分子·····	513
郑孝胥与伪满洲国傀儡政权·····	526
中国近代民族觉醒和传统文化的命运·····	557
再谈中国近代农民问题·····	575
论张元济·····	587
胡适与张元济·····	612
近代传统及其他·····	629
浅议近代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的历史作用·····	634
历史学要走出“史学界”·····	637
关于中国近代史研究重点的转移·····	643
中国近代史“终”于何时·····	651

纵目新编话严复

——读《严复集》·····	656
从《葵园四种》说到王先谦·····	659
梁启超的治学风格·····	662
戊戌辛亥之际的一个历史记录	
——《秦力山集》读后·····	668
后期的章太炎并不是“宁静的学者”·····	671
读实藤惠秀著《中国人留学日本史》·····	676
中华书局的七十年·····	680
附:李侃年谱 ·····	697

鸦片战争前后“士林风气”的变化

1840年的鸦片战争,是中国由封建社会逐步变成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转折点。在这个历史的转变时期,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都开始发生变化。作为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在意识形态上的反映并为其服务的思想文化,也随之发生了变化。以鸦片战争失败为契机,随着中国封建主义思想在与外国侵略者较量中的败阵,先进的中国人开始了向西方寻找真理的艰辛曲折、漫长而痛苦的过程。对于鸦片战争前后中国封建士大夫思想变化的情况,作一些探讨,是研究中国近代思想史的一个必要课题。

一

龚自珍在1839年写过这样一首诗:“河汾房杜有人疑,名位千秋处士卑。一事平生无齟齬,但开风气不为师。”表面上看,这首诗是有感于王通和房玄龄、杜如晦的事迹,借以抒发作者自己的感慨和心愿,但实际上则是对当时社会政治表示不满,要求改变现状而发出的呼声。龚自珍在这里提出了“开风气”的问题,并把这当作自己的抱负和责任。他所要开的“风气”,就是当时通常所说的“士林风气”。但它的内容,却不仅仅限于封建士大夫的学术思想和作风,而是包括整个封建统治阶级的政治思想和社会风气。那么当时的所谓“士林风气”又是怎样一种状况呢?

在鸦片战争以前的将近半个世纪中,清朝的封建统治已经腐

败不堪,整个社会呈现出一幅生产停滞,经济衰败,政治昏暗,万象萧疏的残破景象。这种经济衰落和政治腐败的现实,反映在思想文化领域,则表现为一种死气沉沉、万马齐喑的局面。龚自珍渴望打破这种局面,在封建士大夫中间开拓一种新的“士林风气”,以便给濒于僵死的封建制度的肌体注入一些新的思想血液。

说到“士林风气”,早在龚自珍以前,就有一部分封建士大夫关心这个问题了。随着“康乾盛世”的消逝,为清初封建统治者的“文治武功”作点缀装饰而盛行一时的汉学,亦日渐走向末路。这个曾被誉清代学术史上有着光辉业绩的学派,在封建统治阶级的“内忧外患”面前,日益显露出它的陈腐和无用。尽管他们中间一些严肃的学者,在整理古代文献典籍方面作出了很大的成绩,但是那种建筑在脱离实际基础上的学术业绩,对于挽救封建统治的危机却无能为力。学术总是为一定阶级的政治和经济利益服务的,封建统治阶级向来是把学术当作维系“世道人心”的工具。“汉学”,从表面上看似乎是与政治无关的“纯学术”,但这种以脱离政治为特征的“汉学”,恰恰是为清朝统治者所需要,而且是清初大兴文字狱以后学术思想的畸形发展。以训诂考据解经治经的汉学家,不但几乎垄断了鸦片战争以前一个长时期的清代学术界,而且他们中间的一部分人又经过科举考试进身于官场,往往是学者兼官僚,一身二任。这就形成了一股相当强大的政治势力和思想势力,在“汉学”和“经学”的标榜之下,给士大夫们造成了无形的思想枷锁。大多数的地主阶级的学者和知识分子,都把时间和精力消磨在文字训诂、名物考据,以及八股词章之中,而对于国计民生、时事政治不闻不问。当着封建统治相对稳定,社会阶级矛盾尚未十分激化的时候,它还可以起到为清朝统治者装潢门面、粉饰太平的作用,而到了封建统治面临危机的时候,它就一筹莫展、毫无用处了。因

此,在鸦片战争以前的几十年中,有一些对清朝的政治腐败感到不满、要求改变现状的士大夫,在他们探究导致清朝统治衰落的原因时,就往往把抨击的矛头指向汉学。潘德舆说:“数十年来,承学之士,华者骋词章,质者研考据,……风尚既成,转相祖袭,牢不可诘,天下之士,遂真以食色为切己,廉耻为务名,攫利禄为才贤,究义理为迷惑,而官箴玷、民俗薄、生计绌、狱讼繁、百害籍籍,乘此而起。”^①与潘德舆同时的沈垚也说:“乾隆中叶后,士人习气,考证于不必考之地,上下务为相蒙,学术衰而人才坏。”^②而在封建学者当中,对汉学攻击得最猛烈的则是桐城派的方东树,他专门写了《汉学商兑》一书,对清代的许多“汉学大师”逐个抨击。他说:“汉学诸人,言言有据,字字有考,只向纸上与古人争训诂形声,传注驳杂,援据群籍,证佐数百千条,反之身己心行,推之民人家国,了无益处,徒使人狂惑失守,不得所用。”他甚至把汉学比做洪水猛兽和杀人毒药:“今汉学家首以言理为厉禁,是率天下而从于昏也。拔本塞源,邪说横议,较之杨墨佛老而更陋,拟之洪水猛兽而更凶。”“宋学之虚,如饮菰术之汁,汉学之实,如饱乌头附子,鸩酒毒脯,裂肠洞胃,狂吼以死而已。”^③对汉学和汉学家表示了深恶痛绝的态度,认为汉学是毒人害政的祸根。

当时,这些士大夫们抨击汉学,决不仅仅是学术上的争论,而是有着更深刻的社会政治原因的。这些士大夫目睹当时社会风气的败坏,官场的黑暗腐朽,痛感“士林风气”对“官场风气”的恶劣影响,因此他们又很自然地把抨击汉学和揭露官吏的贪黷昏聩联系

① 《晚醒斋随笔序》,《养一斋集》卷18。

② 《与孙愈愚》,《落帆楼文集》卷8。

③ 《汉学商兑》卷中之上、卷下。

起来。沈垚对当时社会风气的败坏,抨击得更为猛烈,他愤愤写道:“今日风气,备有元、成时之阿谀,大中时之轻薄,明昌、贞祐时之苟且。海宇清宴,而风俗如此,实有书契以来所未见。”^①他认为清朝统治下的社会风气已经坏到了极点,简直是集中了历史上西汉末期、北宋末期和金朝末期的那些亡国之象,兼而有之。他还以留居北京期间的切身感受,揭露当时的社会风气和官场腐败情形说:“都下无一事不以利成者,亦无一人真心相与者”,“居都下六年,求一不爱财之人而未之遇”,^②“都下衣冠之会,无有一人言及四方水旱者,终日华轩快马,驰骋于康庄。翰林则谒拜阁师,部郎则进谒台长,公事则胥吏持稿,顾名画诺,私退则优伶横陈,笙歌鼎沸,其间有文雅者,亦不顾民生之艰难,惟有访碑评帖、证据琐屑而已!”^③这种恶浊的“士林风气”和官场恶习,使得一部分士大夫痛心疾首,满怀忧虑。这些抨击汉学鄙陋,揭露官场腐败的士大夫们,大都以封建地主阶级的卫道者自命,他们虽然看出了汉学的无用和它的恶劣影响,并给它加上了严重的罪名,但是他们不可能从本质上打中汉学的要害。这是因为:一则他们颠倒了意识和存在的关系,完全离开封建制度本身,孤立地把汉学看成是万恶之源,而不懂得所谓“汉学”和“士林风气”的败坏,是腐朽的封建社会的经济基础和政治制度在意识形态上的反映;二则他们中间的大多数人在抨击汉学的时候,自己也拿不出什么新的思想武器,只好搬出程朱理学这个同样陈旧腐朽的武器向汉学进攻,大捧程朱,高唱义理,以宋反汉。这当然也同“汉学”一样,无济于事。

① 《与张渊甫》,《落帆楼文集》卷8。

② 同①。

③ 《与许海樵》,《落帆楼文集》卷9。